

中國詩學研究

第
11
輯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中國詩學研究

第⑪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房国贵 彭 敏

封面设计:陈 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研究. 第11辑 /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676-1089-7

I. ①中… II. ①安…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丛刊 IV. ①I207.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8119号

中国诗学研究 第11辑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规 格:880×1230 1/32

印 张:9

字 数:22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089-7

定 价:45.00元(全二册)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国诗学研究》

学术顾问：傅璇琮 刘学锴 刘跃进 莫砺锋

钟振振 邓小军

编 委：丁 放 胡传志 陈文忠 储泰松

杨柏岭

主 编：胡传志

副 主 编：丁 放

本辑执行主编：杨柏岭 凤文学

20 世纪中国诗学研究历程（代前言）

余恕诚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在分向展开的时候，受文学史观影响，最普遍的做法，是按历史时期（朝代）分段进行研究。高校文科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课程，通常就是按先秦汉魏至唐宋元明清的顺序开设。分文体开设课程进行研究的，相对要少得多。分体研究又以戏曲、小说最为突出。这两种文体迟至 20 世纪初方受重视，一开始就有王国维、鲁迅所著的具有典范意义的《宋元戏曲史》（王国维著，1915 年初版）、《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1923 年初版上卷，1924 年初版下卷），初步奠定了学科的基础。从发展上看，戏曲与小说研究均有广泛的可待开发之地，学者继起，经常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或一门课程展开研讨。诗歌、散文则可能由于历史太长，内容太多，完整地把中国诗歌或中国散文作为研究对象或讲授课程的似乎并不算多。但这不等于说 20 世纪学界没有诗学这一概念。实际上诗歌研究，在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占的比重仍然是最大的。断代的诗歌史（如唐代诗史）、分体诗歌史（如乐府诗史）、专题研究（如屈、陶、李、杜；如山水诗、边塞诗等）都相当多，通史也出了好几部。把大量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看，诗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 20 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实际上是存在着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诗学，即使是狭义地理解，仅指有韵之文及相关研究，内容仍然极其广阔，作为研究的研究，也很难全面覆盖。本文主要以

对《诗》《骚》和五、七言诗的研究作为考察对象,且这种研究主要是指对诗歌风貌、特征、流变和作家作品所进行的研究,描绘这一研究在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的演进过程,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至于对历代诗学著作(如钟嵘《诗品》)研究和诗学理论研究,一般亦不予涉及^①。

20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与文学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跟时代思潮和政治文化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中华民族谋求生存发展的奋斗历程极其曲折复杂。伴随着这个历程,中国的人文学科及其中的中国诗学,走过的道路也是曲折的,学者们不断寻求探索、跋涉,走出了一条通向现代科学的道路,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诗》《骚》与继起的汉至清代的五、七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绵历的时间最长,地位最尊,历朝历代都有学者对它进行整理研究,这种整理研究,在封建时代,与诗歌创作、文化需求密切结合,在整个文化结构中有其重要的、不可动摇的地位。随着时代发展、历史变化,它要回答当代文艺创作和文化需求中的种种问题,是现实的文化需要。但到了20世纪,随着社会的巨变,这门学科赖以建立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上中西学术观念的碰撞,它的存在状况,它在观念和方法上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取得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对此笔者拟根据有关材料,予以论述。

^①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诗学》,是欧洲最早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后来欧洲习惯将一切阐述文艺理论的著作,统称诗学。中国古代文献中所使用的“诗学”概念,除专指有关《诗经》研究外,其涵盖范围可将各种类型韵文研究乃至诗歌创作及有关理论研究都包含在内,本文取义则限于《诗》《骚》和五、七言诗研究。

一、20世纪诗学在文化结构中地位作用的变化 及其所取得的成就

（一）地位作用的变化

诗歌在中国文学各种文体中地位最高。其成就至少在元代以前远非其他文体可比。今天的文学史家，对元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固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的代表。但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的新认识，而就当时所处地位而言，诗文仍然最高，戏曲、小说则被视为卑俗低下的文体。文人科举考试、公私交际应用以及日常抒情言志，仍然离不开诗。因而对于诗艺进行探讨，对历代诗作进行整理研究，总结得失，予以借鉴，是与当代诗歌创作、文化需求紧密结合的。但到了20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新文化运动从酝酿到展开，使小说、剧本创作居于更突出的地位，诗歌则以白话新诗为主流。研究传统五、七言诗的诗学遂与当代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读者对于古典诗歌及其研究，在接受上也从重在吸取创作经验、寻求创作范式，转为偏重于欣赏和认识，诗学面对的社会文化需求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又是弱势的中国文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不得不努力吸取西方的东西，不得不调整改变自己的格局体系和方法内容的时期，西方各种文艺理论和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大量输入，引起文艺学等各门学科迅速变化。诗学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走出了传统，不断变革发展。

（二）诗学所取得的成就

20世纪的诗学成就，有一系列成果为标志，它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它的估价，可能并不一致，其中有视角和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问题。

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20世纪以前，不仅《诗经》解读研究是所谓经学，即使是整理研究以楚辞、汉乐府、李杜诗为代表

的其他时代的诗歌,也往往被认为是非彦材硕学者不可以从事。它可算属于身份高贵的显学,历代相关成果非常丰富,并且形成传统。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和积累,进入20世纪后,诗学不可能像小说研究和戏曲研究作为新兴学科而轻易让人感到有新建树新开拓。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文学观念输入,研究对象的地位上升而异军突起。诗学的演进和变化,跟传统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往往不是填补空白式的或求异性的开拓,而是以历代整理积累下来的材料为重要基础和出发点,吸收其他学科特别是西方人文学科观念和成分,对传统的观念和方法进行改造,为其演进的基本势态。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诗学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相反地,20世纪中国诗学走的是一条推陈出新之路,学界投入人力之多,著名学者密集程度之盛,各类著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文学艺术类的各门学科中,仍然是很突出的。

(1) 诗学摆正位置与诗史发展观念形成。诗学,特别是其中的《诗经》学,汉以后长期被奉为“经”学,处在不恰当的位置上。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和疑古派对“诗三百”的经学地位发起攻击,恢复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正常位置。同时,科学文体观念的树立,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本)都是文学重要体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各种文体本质上无贵贱之分,使诗歌处于与其他文体平等并列的位置,也有助于让诗在与其他文体的联系和对照中,在彼此起伏盛衰的倚伏消长中,更清楚地认识它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与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

近代以来,进化论思想广泛传播,文学史观也深受影响。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胡适批评历史循环论,认为中国文学不曾停滞,也不曾倒退,而始终在发展进步(见其《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等文)。就诗歌而言,伴随《诗经》至高无上的“经”的地位动摇,传统的四言胜五言,五言胜七言,七言胜长短句的“诗

以代降”的倒退论被舍弃，代之以进化发展的观念，乃至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承认《诗》《骚》之后，五言诗兴起是一种发展进步，五言之后出现七言，五、七言诗之后出现词，也是一种进步。胡适把诗的进化和诗体解放联系在一起考察，说“我们若用历史进化的眼光来看中国诗的变迁，方可看出自《三百篇》到现在，诗的进化没有一回不是跟着诗体的进化来的”。认为从《三百篇》到楚辞，到五七言诗，到词，到新诗，是诗体的四次大解放，“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谈新诗》）。进化的观念，在一些学者那里，还逐渐发展到具有辩证的意识，承认发展不是直线的，有曲折有起伏，甚至有充分发展之后的衰变、蜕变。南北朝诗对于汉魏诗并非只有发展进步的一面，也有严重丢失的一面，到唐诗才能全面吸收以往发展中的优点，补其不足，推向高潮。其后的五、七言诗虽未必再能超胜唐诗，但仍有变化发展。其中有诗体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作用，有各种文体相互影响的作用。由各种因素决定着它在各个时期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和走向。这种发展过程清代叶燮等人曾作过一些描述，但从总体看，多数学者以往是缺少认识的。以演进发展观念看文学，尤其是看诗歌，是这个世纪确立起来的。1928年，李维著《诗史》（北平石棱精舍发行），从“中国诗之起源”，一直叙述到“清诗极衰为旧体诗之终局”。其中章节，如“《三百篇》为中国诗学之渊藪”“楚辞代兴与春秋战国诗学之中断”“两汉诗体衍进及乐府之特盛”“魏诗为六朝诗学之先导”“盛唐诗学鼎盛及诗体之大成”“明诗再降与复古声中各派之起伏”等。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诗史，所持的即是一种发展变化，有起伏、蜕变与盛衰的观点。1931年，陆侃如、冯沅君出版《中国诗史》，对于自周代至唐末诗歌的发展衍变论述尤为深入^①。它特别注重对各类诗歌体裁起

^① 该书从《诗经》、楚辞叙起，直至近代之散曲。而词及散曲盛行后的诗词，在不取之列。故叙五、七言诗，截止到唐末。

源过程的察证,已是一部较为详尽的诗歌形式发展史。撰写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几部诗史的出现,标志着学术界对于中国诗歌发展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认识。

(2) 理性观念的加强,综合研究的展开。传统的诗学,文献整理占重要位置,学者于理论批评用力不多。系统的、深度的理论研究很少见。多半是各类诗话,以及诗集序跋、论诗的书信、文章等,包含若干理论批评,而又多半是一些直感与印象。从总体看,一般是零散的,缺少系统整理与具体论证,更缺少在深入分析基础上的理论提升。20世纪,随着西学东渐,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加强,不少论诗的著作不再是三言两语、碎金散珠式的,而是围绕论题,努力分析陈述,甚至上下纵横联系,理清其来龙去脉,上升为理论探讨。其间最为突出的:一是史的认识;二是背景的把握与综合研究。

诗学理论研究的加强,跟史的观念树立密切相关。受文学进化思潮影响,受本世纪成为热点的编写文学史的带动,研究中注意了“史”的梳理探索,不仅有《中国诗史》《中国韵文演变史》《唐诗史》《宋诗史》等按时间顺序编史的出现,而且有按体裁、题材编写的专史的出现。许多文章著述也都有对于诗学演进嬗变轨迹的揭示和理论探讨。出现把诗学理论和作家实际创作结合起来的“史”的考察。

理性精神的上升,在诗学领域里也给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运用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中国诗论有知人论世的传统。这本来可以导致理论研究的发展,但历代所谓论世,多限于将作品与一般政治背景或重大政治事件对照,多本事的考索,比较机械,跟作家作品之间有时距离较远,甚至无关,从而滋长了穿凿比附、钉铨琐碎的弊端。20世纪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作家作品乃至诗风嬗变背景的考察,则发展到对除政治、经济、军事外,更有文化艺术、考试制度、审美风尚、民族、宗教、民俗、

地域等各个方面，成为一种综合的既有环境背景的全方位审视，又有从一般社会生活到作品产出、形成个人或时代风貌特征的中介考查。在诗学范围内引入了诸如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各种学科理论知识和西方某些理论视角，形成多方面综合，推动诗学特别在理论分析方面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态势。尽管理论研究在诗学研究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仍是较为薄弱的一环，但缘于这一方面的基础和传统本来比较薄弱，能有今天的一系列成果和发展趋势，20世纪在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还是不应低估的。

（3）增强笺释校订、资料整理等文献考据工作的目的性，推进了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实证与理论的结合。部分学者中可能有两种倾向：一种主张只有文本研究和理论研究才能叫研究，鄙弃资料考证工作，认为是钉饭无用之学。另一种则认为考证才叫真学问，理论研究是一种主观随意的空疏之学，不断花样翻新但缺少生命力。两种看法都不免带有偏向。胡适是喜爱考据、信仰“证据”的，认为艺术分析不是学问。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把话说绝，他承认《红楼梦》研究有重史、重文两大阵营，承认有“文学史的看法”，有“研究文学的看法”。他提倡“整理国故”，资料考据工作无疑要因之受到重视，但他同时特别强调“高远的想象力”，甚至为防止重功力而轻理解的偏向，用心良苦地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严词批评考据之学最盛的清代学术：“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又在《戴东原的哲学》中，赞赏戴震“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的治学精神。说明他个人虽偏爱考据，但在对学术作总体考虑上，仍然不敢偏废理论。

20世纪最后十多年，学术思想倾向与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时不同，一方面文献建设取得突出的成就，一方面曾有些学者贬低文献资料考证工作，甚至认为文献整理考证不属于文学研究，这是

带片面性的观点。实际上如果将文献和理论割裂开来双方都会受损:文献考据会失去目标,变成无谓的考证和订诂之学;而理论研究如果失去文献和事实支持,则往往会成为主观随意的无根之谈。文学研究必须以文本和相关的背景资料乃至接受史材料为研究基础,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订正工作不可缺少,它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和依据,就诗学研究而言,无疑是一项基础工程。

考据学虽在乾嘉时期达于极盛,但其时亦不乏为考据而考据、流于繁琐乃至穿凿附会者。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不能代替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和评价,更不能代替对理论的探讨。20世纪诗学中自觉有目的实证和考据大为增加。如为复原《诗经》对上古人民生活情景的反映,为理清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宗教与文学关系等考证;通过对一些包括中小作家在内的诗人生平与活动的考证,考查其创作历程、文学贡献,进而对一些时期诗歌风尚与流变进行透视,乃至发展为对一代文学作编年史的著述,将可以作为文学背景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大事以及重要历史人物、重要文学活动、重要作品创作,一一排比,详细显现诗歌和一代文学本原状态。这是在史的指导下的材料整理考订工作,通过严密细致的多方面材料汇集排比,又为进一步各种类型的研究,特别是全面而完整的一代文学“史”的研究准备了条件。比较而言,唐代文学文献研究工作,特别是有关诗歌的文献工作,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无疑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某些方面和某些作家的文献工作,已经做到了堪称完备的地步,但整理者不是仅仅着眼于文献,自给自足,而是为进一步研究准备了基础,甚至这些整理者本身就是在文献的基础上做了具有开拓性的更为深入的理论研究。

(4) 专题研究的深入开拓。20世纪的中国是在风云起伏各种斗争和运动接二连三展开的情况下度过的。只有最后20多年是安定的建设时期。但这20年的人才准备不足,同时也不免有商品经

济发展中的某些负面干扰和冲击。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要求学者对于文学史和中国诗学作包罗全局的深度研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形势和格局下，一些有才能有实力，但又可能受年龄和知识结构等条件限制的学者，从实际出发，选取适当的有意义的专题进行了研究。如楚文化与楚辞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魏晋玄学与诗学研究、唐声诗研究、唐五代诗格研究、初盛唐文学革新与演进研究、中唐韩白两大派研究、唐宋诗之争研究、江西诗派及江湖诗派研究、明前后七子研究，以及像屈原、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重要诗人研究，都取得了超出前代的成果。这些成果孤立起来看是点上的局部的深化，但连起来却是带动了全局的深入。这些专题性成果的扩展和沟通，必将带动整体的推进。由于是专题，便于深入，有些专题深入到了过去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甚至未予注意的领域。

（5）空前广泛的普及工作。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人们知识素养、思想观念和文化需求的转变，要求有新的选本和普及读物。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由于领导人和主管部门对普及工作的强调和重视，也由于出版学术专著困难，许多著名学者曾从事选本和知识性读物的撰写。他们功力深厚，态度认真，编撰了一批好的选本和传记性、知识性读物。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余冠英的《诗经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乐府诗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马茂元的《唐诗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冯至《杜甫传》、何其芳《诗歌欣赏》，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有关诗选和通俗读物。这些著作，普及面是旧时代所不能比的，虽是旨在普及，但朴实通俗中有学术品格、学术内涵，在普及和提高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五六十年代学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这些普及性读物，对民族文化和诗学起了重要的传承作用。

80年代，随着文化的复苏，思想的解放，人们对于艺术作品

的阅读欣赏表现了空前的热情,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不少诗歌鉴赏著作。参与撰稿的有不少优秀的中青年专家和老一代著名学者,往往在一部书里汇集了多位老中青学者的成果,其中有不少引人入胜的阐释鉴赏甚至有一些很好的学术见解。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选本,对跨文革前后青年学生走上古典文学和诗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道路,起过积极而重要的引导作用,那么70年代至80年代的优秀鉴赏读物对“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更为年轻一代的研究工作者也起过引导作用。

二、1901—1949: 诗学新局面开启时期

在对20世纪中国诗学研究成绩有了基本估计的基础上,回顾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对它在各个阶段所表现的特征,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便可能看得较为清楚。整个发展与两大因素密切相关:一是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情况与文化思潮;二是研究队伍的状况,而后者又深受前者的影响。整个发展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即20世纪初至1949年为第一期;1949年至20世纪末为第二期。前一时期可以1930年以前为一段,1930年以后为一段;后一时期可以1978年以前为一段,1978年以后为一段。前半个世纪是诗学研究新局面开启时期;后半个世纪,是经历曲折、研究多方面推进时期。

(一) 1900—1930: 新文化运动对诗学的洗礼

20世纪上半段诗学研究新方向的真正展开,在“五四”新文化运兴起之后。诗学的新局面,跟新文化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和支配。它的新局面,是新文化运动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体现。20世纪上半段的诗学研究,在“五四”之前仅为准备时期,其中意义较大的是文学史的意识、纯文学的意识渐渐树立。受西方和日本影响,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文学

史，在世纪初出了几部，这些著作，给学术界带来了有关文学的“史”的意识，启发了对于绵延数千年的中国诗歌发展流变的系统性的关注。同时由文学史逐渐强化的纯文学观念对认识诗歌的特质、诗与其他文体异同关系，也是一种巨大的启发。

诗学研究领域兴起大波澜、展现新视野、产生新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传统的诗学研究实际上有两条线索：一条是经学的，沿毛《诗》、郑《笺》、孔颖达《五经正义》而下，不止限于《诗经》研究，同时包括以经学的路数、眼光、标准去规范对其他时代的诗歌研究；一条则是属于诗学文学研究。从王逸等人的《楚辞》研究，到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到历代诗话和诗人诗作的整理研究，大体上属于后一条线。前条线与实际诗歌创作、与大众阅读距离很远，但有很高的地位。它被作为权威尊奉，对于诗歌解读、诗歌创作、诗学思想具有严重的束缚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方面给原来受贬斥的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争地位，一方面胡适以新文化运动领导人身份，向《诗经》经学化发动猛攻。说要把《诗经》从经学位置上拉下来，还其文学的本来身份，并且通过一系列诗篇的考释，说明《诗经》中许多作品原来是写男女情爱之作。与此同时，疑古派则以更多的文章，展开对《诗经》的讨论，恢复《诗经》的真面目。郭沫若将《诗经·国风》中40首“男女相恋的情歌”，译成新诗，题名《卷耳集》，于1923年8月出版，更是通过今译的方式还《诗经》本来的文学身份。

与《诗经》研究从经学到文学重大转变相应，杜甫被称为“诗圣”，在封建时代也多半因为他有较强的儒学思想和忠君意识，而宋人更把他塑造成“每饭不忘君”的忠君典范，以新的眼光审视封建时代所塑造的杜甫形象，这显然是不能被认可的。梁启超在1922年发表了《情圣杜诗》，认为杜之圣不在于忠君，而在于富于情感而又表达得极其成功。这与把《诗经》作为正常的

文学作品看,根源是一样的。《诗经》特别为人注目,成为热点,是新文化运动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反映。与此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处在乱世,文化思想背景特殊,儒学正宗地位衰落,士人思想脱离儒学轨道,在玄学的作用下,表现出求解放、任自然和各种逸出常轨的倾向,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讲义》在论六朝诗歌和其他体裁文学创作的同时,兼及社会背景探讨,先述“变迁之迹”,然后考“变迁之由”,表现出发展进化,并将这种演变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意识。鲁迅于1913年开始编校《嵇康集》,于1927年7月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魏晋名士与时相迁、蔑视礼法表示欣赏,同时通过对其创作与生活关系的分析,也有把贵族文学还原到世俗的意思。

梁启超1922年写了《陶渊明》,评陶渊明思想与艺术云:“渊明何以能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艺?一定有他整个的人生观在背后。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可以拿两个字包括他:‘自然’……”“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渊明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他觉得做别人奴隶,回避还容易,自己甘心做自己的奴隶,便永远不能解放了。”这些论述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是一致的。梁启超研究陶渊明并写出专著,显然与当时的新认识新视角有关。

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等新文学观念和目光,来审视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对诗歌也是一次重新定位。此时,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不用说成为攻击对象,地位跌落;戏曲、小说固然由低下的俗类,上升到了作为主要文学品种的正宗地位;而赋和骈文却更因为典雅僵化,与白话文精神相悖,遭到贬低乃至否定。胡适站在白话文的立场上反观中国文学史,同时也为壮大白话的声势和来头,遂探寻总结所谓白话文学史,他从1921年开始讲授白话文学史,并编印讲义,几经修改,于1927年由新月出版社正

式出版。全书十六章，依次为：古文是何时死的、白话文学的背景（按：此章主要篇幅是介绍汉初歌谣）、汉朝的民歌、汉朝的散文、汉末魏晋的文学、故事诗的起来、南北新民族的文学、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佛教的翻译文学（上）、佛教的翻译文学（下）、唐初的白话诗、八世纪的乐府新词、歌唱自然的诗人、杜甫、大历长庆间的诗人、元稹白居易。以上各章，仅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谈汉代散文。其余各章均是谈诗，或与诗有密切关系。（九、十章讲佛教的翻译文学，散与偈体夹杂并用，许多时候即近于诗。宣传教旨，“梵呗”的歌唱，也接近念诗。）因此这部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诗史。胡适为白话文壮大声势，今天已无多大现实意义。但他接近民间接近现实，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给北宋以前文学理出一条以诗体为主的值得肯定的线索，却是在五、七言旧体诗已逐渐为新诗所代替的背景下，为中国古代诗歌争了历史地位^①，这种基调，为以后一些文学史所承续，诸史描述宋以前文学，一般都是以诗歌居于主干地位。同时《白话文学史》所肯定的对象在以后研究中格外受到重视，如汉魏乐府、唐诗等，尤其是胡适以一半以上篇幅所肯定的唐诗，其后学者研究的热情和投入的力量超过了前代最受重视的《诗经》和楚辞。《白话文学史》重视民歌和通俗的诗歌韵文，论证“文学的新形式都是出于民间的”，对于学界影响极深。郑振铎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研究思路即由此出。郑书中讲得最多的是民歌。从周代歌谣《诗经》，到清代民歌《白雪遗音》，差不多每个朝代民歌都讲到，而对明朝歌谣的分析，尤为突出。《白话文学史》只出版了上部，终于未能写出下部，虽有作者精力和时间等关系，文学史上主要文体转换也是重要原因。上部，宋以前是一段落，以围绕诗体展开为特点；下

^① 胡适对律诗是指责的，但不影响对宋以前整个诗史的肯定。